

三星堆祭祀坑为“神庙失火说” 的几点疑问

◆ 赵殿增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一、问题的由来

三星堆考古已有 90 多年，早期的发现和发掘都集中在遗址群北部的月亮湾遗址。1929 年燕道诚家在院子旁修水沟时，挖出 400 余件玉石器^①。1934 年华西协和大博物馆葛维汉、林名钧在此进行发掘，弄清玉石器是整齐有序地埋藏在一个长 7 英尺、宽 3 英尺、深 3 英尺的长方形土坑之中的，并在探沟中发现了陶器和石器^②，被定名为“广汉文化”^③。1963 年四川大学第一届考古专业学生在冯汉骥带领下到月亮湾遗址进行考古实习发掘^④。

1956 年省文管会王家佑、江甸潮在进行宝成铁路文物调查时，发现了月亮湾南面的三星堆遗址和西面的横梁子遗址，没有进行发掘^⑤。文化大革命中在三星堆修起了砖厂，遗址受到严重破坏。1980 年起四川省博物馆、考古所在三星堆遗址连续进行了六次抢救性发掘，前两次发掘初步弄清了遗址的内涵和年代分期，在发掘报告中正式定名为“三星堆文化”^⑥，并通过 1981 年春的直升飞机航拍，使三星堆遗址名声大振。1984 年苏秉琦考察后指出三星堆文化“成系统”，“有特征”，“这才是巴蜀文化”，应该以此作为“学科生长点”，建立考古基地，进行系统研究^⑦。1985 年省考古所在此建立了“三星堆考古工作站”，调查了遗址范围，发现了城墙，1987 年苏秉琦把它正式命名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⑧。

为了给保护三星堆遗址提供充足的依据，1986 年春省考古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联合进行了一次大规

模发掘，进一步厘清了遗址的内涵和年代分期，取得丰硕成果^⑨。国家文物局领导专家前来检查工地，给予充分肯定，并与省市县有关领导共同制定了“各出一部分经费，拆除砖厂，全面保护三星堆遗址”的工作方案。

正在努力落实经费时，1986 年 7、8 月砖厂民工在考古队控制下取土时，先后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省考古所马上组织了抢救性发掘，发现了青铜大立人像、突目大面具、巨型神树等两千多件奇特珍贵的文物，轰动了世界。砖厂最终拆除，三星堆遗址得到全面保护。1988 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定了 12 平方千米的保护范围，包含有十几处遗址，最终决定以“三星堆遗址”作为整个遗址群的总称(图一)。

对于三星堆考古领队陈德安、陈显丹将 1986 年发掘的两个大型土坑定名为祭祀坑^⑩，虽然得到了主管部门和出版机构的认同，已经在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博物馆基本陈列、国内外展览宣传中正式采用，并为广大社会大众所了解和接受，但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不同的意见，核心是不承认这些坑是一种具有主观意图的祭祀行为，而只是一种偶然的发现，所以不能称之为“祭祀坑”，其中以“战败亡国掩埋坑说”最为盛行，又分为“敌人掩埋说”和“自己掩埋说”两种说法^⑪。

2019 年四川省制订了《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准备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全面勘探和主动发掘，并列入了国家文物局的《考古中国——中国文明探源工程》。从 2019 年底到 2020 年初，通过勘探在原来的两座大型祭祀坑旁边，又新发现了六座大型祭祀



图一 三星堆遗址文化分布与发掘情况示意图

(采自赵殿增《早期中国文明丛书——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第128页)

坑^①(图二)。2020年9月就地建造起全封闭的“考古工作舱”，组织全国三十多个考古科研单位人员，进行了一次高水平的考古大会战，已经发掘出上万件珍贵文物，取得巨大成功，再次轰动世界^②。

目前发掘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但对于这些坑的性质和形成原因，仍然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认识，“定名问题”又一次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其中支持“祭祀坑说”的日渐增多^③，“战败掩埋说”好像基本上被否定了^④，而“神庙失火说”似乎又开始占了上风，但其中仍有不少问题难以自圆其说。本文准备就此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供大家研究参考。

二、对“神庙失火说”的几点疑问

1.“神庙”原在何处？

有的说“神庙”原来就是在三星堆(如孙华)，但三星堆上和堆旁都没有发现大型建筑遗迹；有的说是在遗址北部的青关山(如赵殿增)^⑤(图三)，但青关山与

三星堆相距上千米，失火后为什么不就地掩埋？非要全部搬到三星堆后，再分开埋藏？

2.“神庙”因何失火？

如果神庙是无意造成的失火，为什么不原地重修？或化铜重铸？从青关山夯土台基的剖面看，这里的大房子可能曾经重修过多次；从祭祀坑中一些铜器的内部结构看，也有一些器物曾经是用旧铜器化铜后重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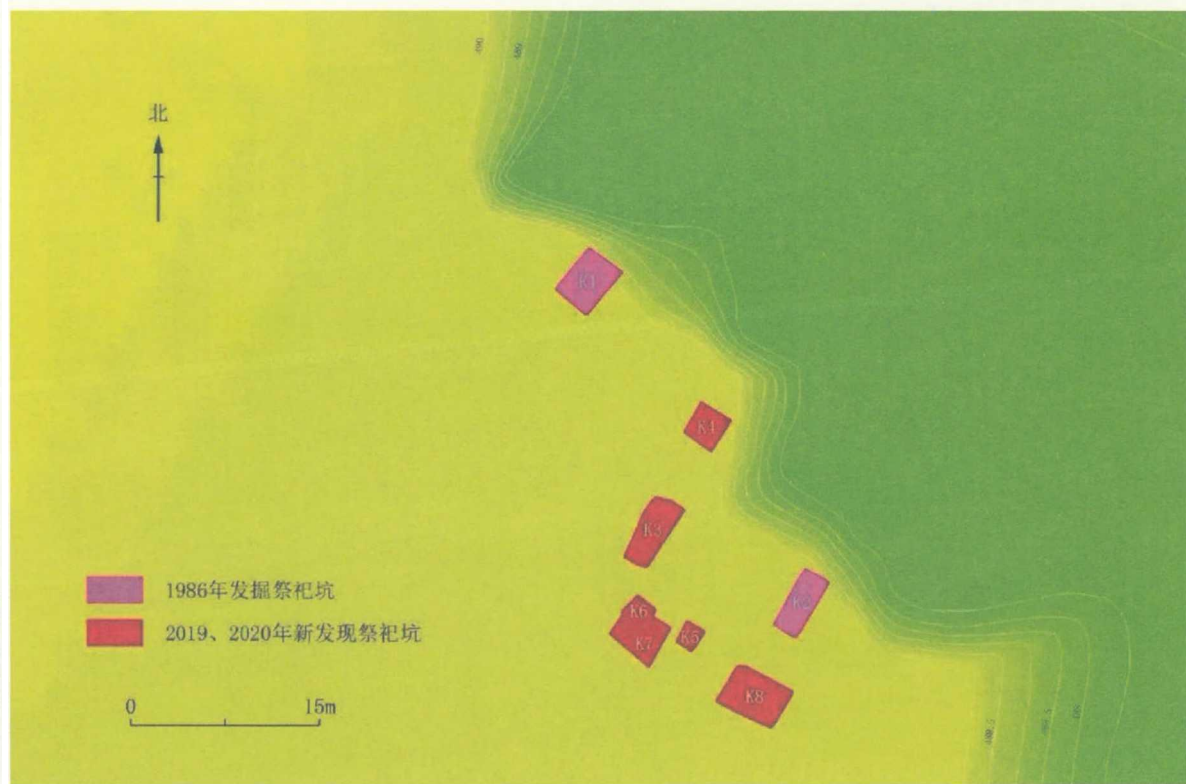
3.为何要先打碎后再烧？

祭祀坑中的铜器，基本上都是先打碎后再焚烧的，这与在房子失火中被烧坏的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又是为什么？

4.为何会烧结得如此严重？

祭祀坑中的铜器很多都被烧结得熔化变形，甚至熔结在一起，这种情况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旺火焚烧才有可能，而与房屋失火被烧伤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

5.为何器物烧结程度的差别非常大？



图二 三星堆祭祀区祭祀坑分布图(采自三星堆祭祀区 2021 年发掘现场展板)

另外，各件器物的烧结程度又有很大的不同，有些烧损程度很低，有些已经熔结在一起了，这又是为什么？

6. 为何绝大多数象牙都没有被烧毁？

象牙是三星堆神庙祭祀中的一种主要祭品和通神之器，但祭祀坑中的绝大多数象牙并没有被烧过，而是完好地平整覆盖在被打碎烧毁的铜器层上面，这又是为什么？

7. 为何要把烧毁的器物全部埋到了三星堆的旁边？

在三星堆附近并没有发现作为火灾“第一现场”的大型建筑物遗迹；青关山大房子如果是“第一现场”，又与三星堆相距了上千米，为什么一定要把失火后大房子中的器物全部都运到三星堆旁边来埋？“第一现场”和“第二现场”为什么要相距这么远？有的坑内还发现有一层“尚未烧透的热草木灰”，又是如何从“第一现场”直接搬到“第二现场”来的？

8. 为何要用三、四种不同形状和大小的六个坑来埋？

三星堆旁有六座坑中埋藏有被打碎烧毁的铜器玉器神像和祭品，每座坑都修建得非常规整。这些坑的形状和大小，又分为了三四种不同的情况（一号坑呈长方形， 3.3×4.5 米，面积13平方米。二号坑 2.3×5.3 米，面积11平方米，三号坑 2.1×5 米，面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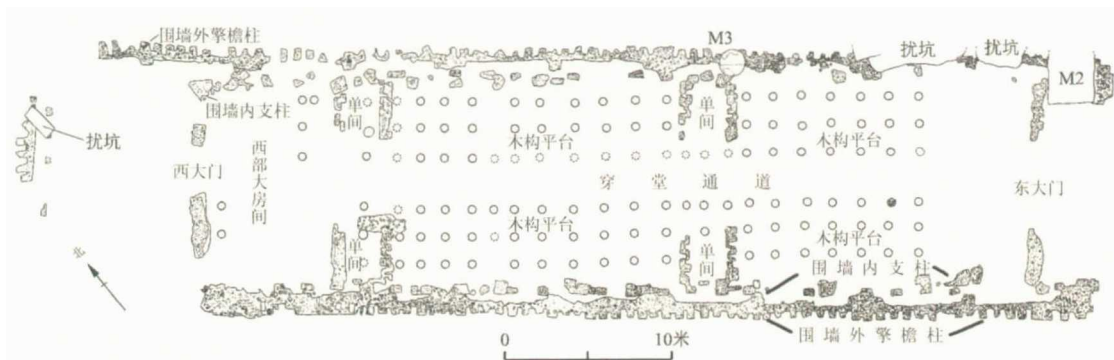
11平方米，这两座坑的形状均呈长条形，大小面积也基本相同。四号坑呈正方形，为 2.9×3 米，面积8.4平方米。七号坑面积13.5平方米，八号坑 3.4×5.8 米，面积19平方米，这两座坑均呈长方形，方向大体相同^⑧。总体上看，很有可能二号坑与三号坑曾为一组，七号坑与八号坑另为一组，一号坑与四号坑则是单独的两个坑。如果是一次掩埋的，为什么要建造这么多不同形状与大小，又都很规整的土坑呢？

9. 为何六个坑中埋的器物数量和种类有明显的差别？

从发掘情况看，六个坑中埋的器物数量和种类有明显的差别。其中二号坑和三号坑基本相同，多为大型器物；七号坑和八号坑大体相同；四号坑象牙层下面的器物很少，并有一些实用的器具，一号坑的碎骨渣下面却摆放着金杖等最高等级的器物。这些情况说明很可能曾经有过多次不同的祭祀和埋藏仪式，其中二号坑和三号坑、七号坑和八号坑很有可能是同时建造掩埋的。

10. 为何有五座坑中的器物之上覆盖了一层完好的大象牙？

除了一号坑外，其他五座坑中都是将器物打碎焚烧后平放在了坑底，再在器物之上覆盖了很厚一层完整的大象牙，最后再用五花土填平夯实，说明祭祀与埋藏活动是郑重虔诚从容有序地进行的，具有十分神



图三 三星堆遗址青关山一号大房子(神庙)的平面结构与功能复原示意图

(采自《四川文物》2021年第1期第84页)

圣的仪式感。特别是要用象牙来覆盖,又有什么样的特别寓意?

11. 为何四号坑中的象牙层上,又有一层尚未烧透的热草木灰?

在四号坑的象牙层之上,发现有一层15厘米厚的草木灰,放入土坑之前尚没有烧透,灰烬的余热已将下面的象牙烫坏熏黑。这些热草木灰绝不可能是从失火的“神庙”处直接搬运过来,只可能是在土坑旁边进行焚烧的。

12. 为何在八号坑中的象牙层之上,又埋入了大量的破碎器物和红烧土块?

八号坑不但最大,而且最深。在八号坑的象牙层之上,又埋入大量的破碎的器物,已经清理出土的有四千多件,还有一些类似墙体的红烧土块。这些红烧土块倒很像是被烧毁的“神庙”之类的建筑物墙体。大量的破碎器物,又很像是被清理的大房子中的剩余残器。这种现象是否是说明:在最后的一次燎祭之后,将“神庙”也一并烧毁了,并将残余的碎器物都埋入了八号坑之中,然后从三星堆迁都到了金沙遗址?这又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13. 为何一号坑中出现了倾倒在坑底烧透砸碎的动物和人的碎骨渣等情况?

相比于其他五座坑,一号坑的埋藏情况则有很多特殊之处。它不但在坑底的中央摆放了一柄最高等级的器物——曾经使用过的金杖,而且在坑口上从东南向西北方倾倒了大半坑烧透砸碎的动物与人的细小骨渣,骨渣中还混杂有小尖底盏、小器座等陶器。在坑底散乱的器物之上,并没有覆盖一层完整的大象牙,反而摆放了几颗大象的臼齿。在坑口的边上,连接有三条建筑物的沟槽遗迹^⑨。这些情况都说明:一号坑与其他五座坑的建造与埋藏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别,这又是为什么?

14. 六号坑为何会打破七号坑?

发掘中发现六号坑打破了七号坑,显然不会是同时修建的,说明六号坑要比七号坑时间晚很久,坑内也不见铜器与象牙,两者应该是不同时代不同功能的祭祀坑。

15. 五号和六号坑为何要小很多? 器物和埋法为何也与其他坑完全不同?

五号坑坑口为1.78×2米,面积只有3.5平方米,坑底主要摆放着金面具和细小的金器玉器象牙器。六号坑坑口为1.67×1.95米,面积4.1平方米,坑里只发现了一个木箱和一把玉刀。两座坑都比其他六座坑小很多,两坑的位置和方向又比较一致,时间也可能比较接近。这两座小坑与其他六座坑的方向和形状又有一致之处,两组坑之间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会出现在同一个祭祀区之中?

16. 这八座坑的周围为何没有出现其他居住与活动的遗迹?

从目前的勘探情况看,这八座坑的周围尚没有发现其他的居住与活动的遗存。坑口的地面似乎还进行过有意的平整。这些现象是否说明这里曾是一处专门设立的祭祀区? 是否还曾受到三星堆后人的精心保护和继续祭祀?

还有一些问题,这里不再列举。

三、“祭祀坑说”依然值得考虑

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的考古大发掘,已取得了重大的成果,为破解三星堆之谜提供了丰富而完整的资料,使我们能进一步去探求事情的真相。这次提出的“神庙失火说”,说明大家已经认识到这些奇异的器物,原来可能大都是摆放在“神庙”“宗庙”之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但对于将神器打破焚烧埋入坑中的原因,还有些不同的看法。“神庙失火说”者仍然认为这只是个偶然的事件,所以提出来其中六座坑只能称为

“祭祀器物埋藏坑”，建坑和掩埋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祭祀的意义，只有后人再次到此进行祭奠时建造的五号坑和六号坑，才是真正的“祭祀坑”^⑨。

我认为这种看法可能是低估了三星堆先民的信仰程度和真实意图，也低估了当时事态的紧迫性和严重性。一场偶然的火灾，绝不会让他们把“神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全部丢弃埋掉，更不会因此而放弃曾经繁荣兴盛的三星堆古城而迁都到金沙。这期间必然是发生了一系列无法抗拒的特大灾难，才会迫使他们做出如此决绝的行为，通过一组隆重而虔诚的燎祭仪式，彻底处理了神庙中的所有神像和祭器。

我很赞同三星堆祭祀坑中这些奇异的器物原来是摆放在“神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的意见，并且提出了“青关山一号大房子”可能就是“神庙”的新看法^⑩，也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关于这些大型祭祀坑可能是“失灵法器掩埋坑”的观点。

我认为“神庙”中的神像和祭祀用品，是三星堆人经过长期的制造、仿造、引进、征集积累起来的，其中包括有被祭祀的对象、参加祭祀的人员、祭祀的场景、通神的工具、娱神的祭品等。平时三星堆人可能主要是在这些“神庙”中进行各种祭祀活动的，可以看出三星堆文化时期这里曾经存在着一个“主持宗教事物者就是社会的主宰”，“神权决定一切”的神权国家^⑪，从而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

但由于这种神权国家里“充满着宗教狂热”，“把大量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因此垮了下去”^⑫，由于“过度的消耗”，最终造成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和社会恐慌。三星堆古国在遇到重大瘟疫之类无法抗拒的天灾人祸时，可能出现过大量人畜无端死亡的情况，连他们的“群巫之长——国王”可能也一起死去，人们便认为这些神器已经“失灵”了，就用神庙中包括金杖在内的部分神器举行了一次“燎祭”，焚烧打碎尸骨和祭器，郑重地埋入了三星堆旁祭祀区的“一号祭祀坑”中，以此表示把它们送回到了天上和神界，乞求天神和祖先帮助他们消除眼前的灾祸，再次给他们带来好运^⑬。

但灾难可能并没有因此有丝毫消减，反而更为严重了，于是就用更多更大的神像祭器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燎祭，形成“二号祭祀坑”和“三号祭祀坑”。在数次燎祭无效之后，三星堆人便觉得已经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了，只好把所有的神像祭器全部进行了燎祭，形成“七号祭祀坑”和“八号祭祀坑”。最后连同神庙一起烧毁，将所有残存的碎器物和一些墙体烧土块埋在了八号坑的器物层之上，然后迁都到了成都的金沙遗址。而五号坑和六号坑，则可能是三星堆

古国的后人，多年之后再次来到这里进行祭奠时建造的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内外还有很多大小不等的各个时期的祭祀坑，各期都有，以第三期数量最多，体量最大，其中也包括1929年燕家院子旁挖出400余件玉石器的长方形土坑，其用意可能都在于用这种方法表示把神像祭品送往天上和神界，说明这些坑曾经都是祭祀活动的最后一个阶段，都应该称之为祭祀坑^⑭。

这就是我对三星堆祭祀区八座大型祭祀坑成因和过程的简单分析：即“神权国家”是三星堆文化神奇面貌的主要内因；而“过度消耗”则是三星堆快速衰亡并形成大型祭祀坑的根本原因。

这或许能够适当地解释为什么青关山神庙中的大量神器，要搬到三星堆旁的祭祀区来，并通过多次隆重的燎祭仪式，把它们分别埋在数座祭祀坑之中。祭祀区还受到了后人的保护和祭奠，从而将一个神权国家的主要祭祀场所和几乎全部艺术精华，奇迹般地完整保存到了今天。又通过近百年来不懈的考古工作，把一个失落的文明和它的艺术宝库再现于世，保存下来一处奇特而壮观的宏大祭祀区遗迹，和上万件精美而怪异的神像与祭器。

四、余论：探讨仍将继续

三星堆遗址在中国考古学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它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满天星斗”的中国文明起源阶段的一颗灿烂的明星，具有两千多年的连续发展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高大伦认为它是研究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蜕变，文明起源、孕育、诞生、发展、辉煌、衰落的绝佳实物标本。从在一个遗址上集以上几者于一身，人类古文明在一个遗址上长时间地演绎了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意义上来说，也是中国唯一的标本^⑮。李学勤明确地指出：“可以断言，如果没有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考虑到巴蜀文化本身的特色，以及其与中原、西部、南方各古代文化间具有的种种关系，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⑯。“不难预计，在最近的一二十年里，一定会在三星堆和其他地点有更多更重要的新发现。”^⑰近年三星堆六座祭祀坑的发掘已经证实了李先生的预言。

三星堆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但从遗迹现象和出土文物的奇特性、珍贵性、重要性和复杂性而言，这组大型祭祀坑的内涵、性质、成因和意义，都是无法绕开的重大课题。这里所谈的“神庙失火说”，亦或“法器失

灵说”，都只是目前众多推测中的两种，还不能说是已经得到足够证明的最终结论。因为三星堆遗址内外出现的这些坑的形态和器物太特殊了，在国内外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记载可查，它的形成很可能有其独特的内在因素。我们只是认为这些坑可能是具有主观意图的一种祭祀行为，从广义上将它们称之为“祭祀坑”。

不过现在大家的认识也在逐渐接近，如已经认识到多数坑中的文物原来可能是摆放在“神庙”“宗庙”之中的，是长期积累起来的，也可能是在比较短的时间范围内埋到六座土坑里的。只是我们认为这些文物是分批搬到三星堆旁的祭祀区来，在举行了多次隆重的燎祭仪式之后，分别埋在数座祭祀坑中的，并且还受到了后人的精心保护和继续祭奠，相关情况上文中已经讲清楚了。而“神庙失火说”论者则认为其中的六座坑是在一次失火之后同时掩埋的，是一种火灾事故的善后处理行为，不具备宗教和祭祀意义。

他们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认为在不同的坑中，有可能出现相似的器型和纹饰，还可能会有能拼接在一起的器物残件（目前尚无实证）。其实即使出现这种现象，也并不奇怪，因为既然多数坑中的文物原来是放在“神庙”“宗庙”之中的，是长期积累起来的，就不可能将各时代的器物分开摆放，更不会一定要选择同时期的器物搬出去进行燎祭。特别是在最后的七、八号两座坑中，可能还掩埋着打扫神庙时的残余物件，其中出现个别前期燎祭时打碎的器物残件，是完全可能的。因此不能以这种推测作为主要的依据，去证明六座坑是一次性掩埋的。至于各座坑具体的年代如何，相互之间有无差别，相差多少，随着数十个更具体更真实的测年数据的公布，加上各坑的情况分析，都会逐渐明确起来，现在还不是先下结论的时候。

只有把这些坑放在整个三星堆文明发展过程中去进行观察和分析，才有可能比较接近历史的真相，努力找出解开谜团的钥匙。而这一切首要的前题，是要把现场的考古发掘和文物现象保护研究工作完全精准地做到位，因此大家都在殷切地期待着这次考古大发掘圆满完成。

苏秉琦在1984年成都召开的文化部文物局“全国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上的重要讲话《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工作质量》中鲜明地指出：“写八百篇论文也不能代替原来的考古发掘材料，就像‘十三经注疏’代替不了‘十三经’一样”“这是文化财，是国宝，是给予子孙永保用的国宝”^⑩。大家应该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等待全部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再仔细地去探寻可能的谜底。为此，我们要向战斗在第一线的田野考古

工作者表达崇高的敬意，期待他们为祖国发掘出更多更完整的“十三经”。

注释：

①冯汉骥、童恩正：《记广汉出土的玉石器》，《文物》1979年第2期，第31~36、30页。

②a.葛维汉著：《汉州（广汉）发掘简报》，《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第85~95页，天地出版社，2006年（原载《葛维汉民族考古学论著》，巴蜀书社，2004年）；b.林名钧：《广汉古代遗物之发现及其研究》（原文刊载于《四川古代文化史》，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1946年）。

③郑德坤：《广汉文化》，《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第104~112页，天地出版社，2006年（原文刊载于《四川古代文化史》第四章，华西大学博物馆专刊之一，1946年）。

④马继贤：《广汉月亮湾遗址发掘追记》，《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第211~227页，天地出版社，2006年。

⑤王家佑、江旬潮：《四川新繁广汉古遗址调查记》，《考古通讯》1958年第8期。

⑥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博物馆、广汉县文化馆：《广汉三星堆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第2期。

⑦⑧苏秉琦：《提高学术水平，提高工作质量——在文化部文物局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会上的讲话》，《四川文物》1984年第3期。（并刊载于苏秉琦：《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第159~163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苏秉琦为“三星堆十二桥遗址考古发掘座谈会”的题词，1987年5月。

⑩1986年春省考古所和四川大学等单位联合对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报告，因受到祭祀坑发现的影响，未能及时完成。

⑪⑫a.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陈德安执笔），文物出版社，1999年；b.陈显丹：《一、二号祭祀坑几个问题的研究》，《四川文物·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1989年。

⑬杨荣新：《巴蜀文化与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四川文物》1992年第4期。

⑭三星堆管委会2004年曾在原有的两个祭祀坑之上，复原了一个参观现场，整个院子正好把祭祀区全部覆盖。2019年12月在复原现场的围墙之外，勘探到了三号坑的一角，在摸到了青铜大口尊之后，把复原现场的建筑物和院子全部拆除，才新发现了六座祭祀坑。可谓是恰逢其时，它们的出世，正赶上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从而促成了这次举世瞩目的高水准的“三星堆大发掘”。

下转 第42页

⑩ Stiles, D. Early hominid behaviour and culture tradition: raw material studies in Bed II, Olduvai Gorge. *The African Archaeological Review*, 1991, 9: 1-19.

⑪ Clark, J.D. The Acheulean industrial complex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In Corruccini, R.S., Ciochon, R.L. (Eds.),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aleoanthropological advance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4: 451-469.

⑫ a. Pope G.G. Evidence on the Age of the Asian Hominida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83, 80: 4988-4992; b. Pope, G.G.. Bamboo and human evolution. *Natural History*, 1989(10): 48-57.

⑬ Schick, K.D. The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 In Corruccini, R.S., Ciochon, R.L. (Eds.):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4: 569-596.

⑭ a. Bordes F. *The Old Stone Ag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8; b. Schick, K.D. The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 In Corruccini, R.S., Ciochon, R.L. (Eds.):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4: 569-596.; c. Clark, J.D. The Acheulean industrial complex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In Corruccini, R.S., Ciochon, R.L. (Eds.):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aleoanthropological advance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4: 451-469; d. Dennell, R. Life without the Movius Line: The structure of the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Early Palaeolithic.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6, 400: 14-22.

⑮ Schick, K.D. The Movius line reconsidered. In Corruccini, R.S., Ciochon, R.L. (Eds.):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aleoanthropological advance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4: 569-596.

⑯ Clark, J.D. The Acheulean industrial complex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In Corruccini, R.S., Ciochon, R.L. (Eds.):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aleoanthropological advance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4: 451-469.

⑰ Mishra, S., Gaillard, C., Hertler, C., et al. India and Java: contrasting records, intimate connections.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10, 223-234: 265-270.

⑱ Clark, J.D. The Acheulean industrial complex in Africa and elsewhere. In Corruccini, R.S., Ciochon, R.L. (Eds.): *Integrative Paths to the Past: Paleoanthropological advances*. Prentice Hall, Englewood Cliffs, 1994: 451-469.

⑲ 贾兰坡:《对中国猿人石器的新看法》,《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第1~8页。

⑳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中国古生物志》总第168册,新丁种第12号,科学出版社,1985年。

㉑ a. Ikawa-Smith, F. Introduction. In F. Ikawa-Smith (ed.): *Early Palaeolithic in South and East Asia*. The Hague: Mouton, 1978: 1-10; b. Pope G.G. Hominid Paleoenvironments in the Far East. In Giacomo Giacobini (ed.): *Hominidae. 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uman Paleontology*. Milan: Jaca Book, 1989: 231-235.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 第 231 页

⑲ 中央电视台 2021 年 3 月、5 月、9 月对这次三星堆大发掘进行了三次现场直播,并在一年中的《探索发现》栏目里播出了八集《探秘三星堆》专辑,其他媒体的报导不计其数,极大地扩展了三星堆考古发掘的影响。

⑳ 唐际根:《“祭祀坑”还是“灭国坑”:三星堆考古背后的观点博弈》,《美成在久》2021 年第 6 期。

㉑ 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三星堆发掘专家咨询组长王巍 2021 年 6 月 6 日在南京大学的讲演中,在谈到“目前三星堆焦点问题”时,认为“三星堆所发现的这批坑状遗迹应当与祭祀密切相关,并不是一次性同时埋藏,也不是敌对人群摧毁三星堆后埋藏;三星堆与金沙不存在暴力性取代迹象;青铜面具是从当地人面部特征出发,基于现实的神话产物;三星堆文化使用文字的可能性不大,但不影响三星堆文明的地位”。

㉒ 赵殿增:《浅谈三星堆遗址青关山 F1 的结构与功能——兼与杜金鹏先生商榷》,《四川文物》2021 年第 3 期。

㉓ 上述数据多采自新闻报导,不一定很准确。

㉔ 参见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执行领队冉宏林 2021 年 11 月 3 日在中央电视台《考古公开课·百年考古大发现·风雅颂歌》节目中的发言等。

㉕ 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对历史的八点启示》,《光明日报》2017 年 2 月 8 日。

㉖ 赵殿增:a.《祭祀坑·神庙·神权国家——试析三星堆之谜》,《巴蜀史志·聚焦三星堆专刊》2021 年第 5 期;b.《略论三星堆祭祀坑》,《美成在久》2021 年第 6 期。

㉗ 高大伦:《三星堆遗址古文明的长度宽度和高度》,《三星堆研究》(第五辑),第 86-90 页,巴蜀书社,2019 年。

㉘ 李学勤:《三星堆考古研究·序言》,第 1-3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 年。

㉙ 李学勤:《三星堆研究·总序》,《三星堆研究》(第一辑),第 1-3 页,天地出版社,2006 年。

(责任编辑:赵蕾)